

“民以食为天”“病从口入”，这两句谚语提醒众人：食品安全大于天。刚被“地沟油”折腾够呛的消费者，最近又被“老酸奶中是否添加了废弃皮革制品制成的工业明胶”弄得一头雾水，“食品安全”又一次被置于聚光灯下。(4月15日新华网)

食品安全事件频出 在于和尚多了

长期以来，食品安全都是个让人摇头的问题、头疼的问题。问题到底出在哪？是管食品安全的人手太少吗，以致忙得监管部门手忙脚乱，按下葫芦浮起瓢？但了解了实情，公众就会发现这是个让人发笑的疑问，或曰伪问题。目前对外公布的涉及食品安全监管的部门达13个，监管机构也多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地位。可是消费者并未从中受惠，毒奶粉走了，瘦肉精、牛肉膏和染色馒头又来了，连体育总局都被“逼”得禁止国家队在外吃肉了。那么多不能再多的人好像都是白吃干饭的，而且这种困惑看起来似乎也没个尽头。

管好一张嘴咋就那么难？对食品安全犯罪，国家有严刑峻法，一般的无良商贩在法律法规面前能有多牛呢？不用说，他们是相当害怕铁面无私的执法的，他们不怕的是虚晃一枪，不怕的是雷声大雨点小。监管部门缺乏责任感，监管缺失，是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主因。无良商贩钻监管的空子，是他们逐利的本性使然，而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是监管漏洞太多，无良商贩有空子可钻，有擦边球可打。譬如，某一食品安全事件被曝光，当地工商部门会以无照经营对当事人做一番简单处罚，但在他搬换地方后，便不了了之。这种走过场式的执法最终能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当是不言自明。

“三个和尚没水吃”，当然是老话儿了，13个和尚人浮于事，不作为，遇事大眼瞪小眼，相互推诿扯皮，不过是个老话儿的现代版。13个部门分管着食品流通的各个环节，看似织成了一张食品安全的密网，但百密一疏，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这张看上去挺好的网就成了一张破网。实践证明，13个和尚一起管食品安全，你指望着他，他巴望着你，照样是没水吃。一个个监管部门皆依赖“侥幸”心理，不能真正严格把关，食品安全事件一个个地出现，便成为一点都不奇怪的事了。

消费者从来都是食品安全事件中的冤主。吃的喝的都难放心，无疑是整个儿的生活都失去了安全感，整个儿的生活品质都受到了损害。多头管理模式听起来好听，但实际是无头管理。有功大家抢，有问题大家推。若再有腐败之事掺杂其中，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保障食品安全是个难题，破解难题全在于有好的制度设计，全在于监管人员的有力作为。具体说就是对无良商贩的监管要到位，出了事，问责要到位，对渎职者的处罚要到位。没有这些到位，则其他神马都是浮云。

11日，上海浦东机场，20名旅客冲上机场滑行道；13日，广州白云机场，又有旅客冲上机场滑行道。三天之内发生两起冲闯机场事件，让人震惊！

拦机事件“比烂”思维当反思

《羊城晚报》在14日的报道中，借网友之口暗示两起事件的关联性，认为在上海发生拦机事件后，拦机旅客不仅未被处罚反而获得1000元的交通补助，变相导致了广州白云机场事件的发生。但我认为，即便两起事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个案与个案之间也只是一般非紧密的关联，而真正的关联则是所有类似事件中的共性部分。几乎所有的因航班延误或者取消导致的闹事事件，都存在一个清晰的演变路径：先是旅客要求解释并赔偿，后是航空公司以“不可抗力”为由冷眼以对，导致旅客情绪失控，场面扩大化，对此航空公司束手无策，处置失当，然后旅客出现过激行为，而航空公司息事宁人，不仅不处罚反而给予丰厚补偿。

这是一个互相比烂的路径。航空公司服务烂，旅客完全可以正当维权，可旅客舍正正当渠道，偏偏采取更烂的方式过激维权；旅客过激维权后，“正当性”回到了航空公司一边，但因为自身存在服务短板，底气不足，只好迁就违法维权的旅客，达成妥善、让步。上海浦东机场事件就是比烂的典型。乘客滞留浦东机场一天，航空公司不给予任何说法和帮助，乘客由此产生权益和尊严被漠视的屈辱感，引发情绪失控。可旅客采取用违法拦机的过激方式维权后，航空公司又怕了，开始“高度重视”，进而违法者得到了超出规定之外的补偿。这样的“善后处置”表面上缓解了矛盾，实质上强化一个错误认知：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反正你航空公司不尊重乘客的正当权益，反正只有把事闹大才会得到“高度重视”，以后遇到类似情绪，索性就搞事闹事。所以说，冲闯机场滑行道事件是双方合谋比烂的结果。双方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既有理又无理。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过激维权的旅客不会反思自己的行为给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航空公司也缺少改进服务的动力。

在互相比烂的博弈中，公共规则和法律法规被虚置。按说，遇到航班延误和取消的情形，旅客的权益应有明确的保障，什么情形下可以不赔，什么情形下航空公司该赔及赔多少，都有明文规定，一些航空公司能拖延就拖延，能耍赖就耍赖，导致旅客维权的正常渠道被堵塞。同理，民航安全也有法律法规，而且还相当严格，可航空公司之所以放着“尚方宝剑”不用，说到底还是因为底气不足，不敢光明磊落地依法办事。

你闹黄灯我闹红灯，大家都比烂，比烂的是公共安全，以及以安全为前提的正常的生活。如果这种比烂的思维还不改，民航不能提高服务质量，旅客不遵守安全规则，难保不会出现下一次拦机事件。 李鸿文

为卫生部的“较真”叫好

事实上，烟草业科研成果参评国家科技奖并非首次。据统计，近10年来，已有7项烟草领域科研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对这种情况，此前不是没有人提出异议。去年某烟草行业的专家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就曾遭遇强烈质疑。但在科学研究、科技政策这样一个门槛很高的领域，普通人的意见很难引起重视，即便是专家观点，也容易在部门管理的高墙前碰壁。这一回，有了来自卫生部门的权威声音，相信问题定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平心而论，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主管的事务发声，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在这一事务“已有先例”的情况下。试想，假设最终结果是这项研究退出评奖，那就说明此前已经获奖的7项成果，其获奖资格同样有待商榷。这不仅可能让参评单位和获奖人心生不悦，也可能让主持评奖的部门“没有面子”。对于这样一种结果，卫生部门不可能没考虑到，但他们仍然敢于坚持原则，敢于鲜明表态，这一态

最近，对于“低危害”烟草制品研究该不该参评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结结实实较了一回真。针对30位院士联名抵制烟草技术参评国家科技奖这一事件，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明确表态：要避免烟草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吸烟，而不是用其他方法降低危害。国家科技奖应该鼓励保护老百姓的健康，不应该鼓励类似“低危害”烟草制品的研究。如此鲜明的态度，令业内外人士普遍击节叫好。

度令人钦佩。90多年前，胡适曾经为“差不多先生”立传，讽刺当时中国社会那些处世不认真的人。到今天，“差不多先生”仍未绝迹。“差不多”的情况主要有二：一种是责任心缺失，懒得较真，自己应尽的责任“差不多就可以了”，遇事爱往人家身上推。以“人造鸡蛋”为例，面对记者的提问，工商局认为应由技术监督局认定，质量技术监督系统

认为该由农业局管，农业部门工作人员则表示“这完全完全属于工商部门管的事”，最后几个部门管不了一只蛋。

另一种情况则是碍于情面，担心得罪人，该管的事情“差不多就得”，不想为此“唱黑脸”。科技部门成立的科研诚信建设机构曾经承诺，对所有实名举报，如不受理必通知举报人，凡受理者必有处理结果。但5年多过去，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标准仍未建立，接受举报的受理、调查、复核、处理程序和制度也不完善，许多时候，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处理由项目承担单位进行，相当于“自己查自己”。这样的监督如何能有效发挥作用？

监督不只是公民的权利，更是管理部门的职责。与普通民众相比，管理部门有更多资源、更强能力，更大的责任，要让社会管理日臻完善、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必须彻底弃绝“差不多”心态，像卫生部这次的表态一样，把公众的感受放在心上，把自己的责任勇敢地担起来。 林尧

近日，在北京多个区县别墅区涉嫌盗窃的嫌疑人杨某，被大兴警方拘留。杨某称，他原是一名木匠，做过装修工，家里因占地得了一大笔补偿款，其实不缺钱。在干装修时，他发现别墅区内的别墅经常空着，觉得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为了搬偷来的财物，他又购买了一辆二手宝马轿车运赃。

杨某称，让他没想到的是，每次驾驶宝马车进出别墅时，保安很是尊敬他，为他出入别墅行了方便。于是，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钟，开着宝马车进入高档别墅区，如发现哪家别墅黑着灯且无人居住，他就入室盗窃。警方已核实杨某涉嫌盗窃12起，案值160余万元。(4月11日《新京报》)

【点评】 骑白马的不一定是王子，也可能是土匪。开宝马的不一定是富豪，也可能是小偷。杨某用二手宝马运赃，这“奇思妙想”还真骗过了不少“以车取人”的保安。“开好车就是好人吗？”不知道这次《天下无贼》台词现实版上演，能唤醒多少安保人员对“宝马”们的警惕？ 漫画/朱慧卿 点评/张玉珂

男子开宝马进别墅区盗窃



毒贩囤积新康泰克提炼冰毒

据齐鲁晚报4月13日报道，山东省多地药店近期出现不少外地人，企图大量购买新康泰克胶囊，不少药店甚至因此断货。为什么会有人大量购买新康泰克这种普通感冒药呢？4月12日，聊城市警方通报侦破一起特大制贩毒品案件，涉案的5个团伙中有两个制毒团伙利用新康泰克感冒药制造出60余克冰毒。这是该省发现的首例以新康泰克感冒药为原料提炼冰毒的案件。 侦破这起特大制贩冰毒案件的聊城市东昌府分局刑侦大队三中队民警告诉记者

者，新康泰克胶囊又名复方盐酸伪麻黄碱缓释胶囊，里面含有的盐酸伪麻黄碱经过加工能提炼出麻黄素，又名麻黄碱，而麻黄素是合成苯丙胺类毒品，也就是制作冰毒最主要的原料。民警告诉记者算了一笔账，该团伙现有技术每10盒新康泰克能提炼1克多冰毒，每盒新康泰克不超过15元，每克冰毒成本在100元左右，但转手就能以每袋0.8克的包装卖800元。如此暴利正是促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的巨大诱惑。

“营养午餐”不能沦为“一桩生意”

自3月1日云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正式实施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来，近日接连发生3起学生营养餐安全事件。记者调查发现，当地个别学校在实施营养餐上力不从心，承包给企业又监管不力。(4月15日《京华时报》)

学生享受国家补贴的免费午餐，本是强身健体、提高身体素质，索性外包；第二，当地过于贫困，无力配套食堂等执行正餐供应；第三，个别官员试图从中渔利，故设法抵制正餐，坚持采购。一旦外包、实行采购，地方政府再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那营养午餐自然就可能成为人人得而食之的“唐僧肉”，沦落为一桩生意。营养午餐沦为生意，其公益性必然淡出；反

飞认为，原因无外乎三点：第一，当地不知道如何操作正餐供应，索性外包；第二，当地过于贫困，无力配套食堂等执行正餐供应；第三，个别官员试图从中渔利，故设法抵制正餐，坚持采购。一旦外包、实行采购，地方政府再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那营养午餐自然就可能成为人人得而食之的“唐僧肉”，沦落为一桩生意。营养午餐沦为生意，其公益性必然淡出；反之，逐利性、功利性，不择手段追求利益最大化必然成为其主要基调。沦为生意，营养午餐也可能成为又一项特殊的资源，成为某些官员“发家致富”的筹码。其中，暗箱操作、囤积交易在所难免，送到官员嘴里的肥肉，必将先从孩子们免费午餐的饭碗中出，官员口中的肉越越肥，孩子们碗中的营养注定越稀薄。 孩子们的餐桌营养、安全保证不了，不仅不利于他们的身体发育，还会导致其他疾病，这自然有悖营养午餐的初衷。这需要相关部门进一步出台配套的详细执行措施、监管机制，让营养午餐重新回归公益之路，而不能沦为“一桩生意”。 陈媛媛

近期，京津地区部分加油站的成品油价格纷纷下调，华东、华南市场也出现较大规模的成品油降价促销现象，部分加油站的汽油价格甚至比调价之前更便宜。据报道，民营加油站是本次“价格战”的主要推手，在其带动下，中石油、中石化旗下的部分加油站也加入降价促销行列。(4月15日新华网)

成品油“价格战”再显定价机制的尴尬

成品油市场的“价格战”时而爆发，且大多爆发于油价大幅上调之后。2009年6月30日，成品油价格每吨大幅上调600元，仅过了几天，市场上的降价促销战便硝烟弥漫，实际零售价下跌幅度最多达500元/吨，几乎抵消了几天前的油价涨幅。

今年3月20日，成品油价再次大涨600元/吨，油价正式步入“8元时代”，消费者为此叫苦不迭。但按照国家发改委的说法，根据成品油定价机制，此次成品油成本每吨上调700元左右，因考虑到社会承受能力才降低了调价幅度。仅仅过了十几天，成品油市场的“价格战”再次狼烟四起，回头看3月20日油价大幅上调，其尴尬和讽刺意味显而易见——近期国际油价并无太大波动，如果国内油价没有上调到位，市场该闹“油荒”才是，为何反而到处都打起了降价促销战？油价是否合理，官方说了不算，市场才是最真实、最客观的验证者，市场的反应从一个侧面说明，国内油价不是没有上调到位，而是调过了头。说得严重一点，市场上的“价格战”无异于给了成品油定价机制一记耳光。

包括官方在内，很多人都认为目前的成品油定价机制有问题，比如22个工作日太长以及所参考的国际油价不合理。实际上，现行定价机制的最大问题在于所依据的基准油价虚高。众所周知，现行定价机制确立于2008年年底，当时国际油价很低，国内油价虚高，换言之，当初定价机制建立在国内虚高油价的基础上。既然初始的基准油价虚高，那么后来无论定价机制如何运转，油价或涨或跌，国内成品油政府定价都难免虚高。

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按照定价机制成品油尚未上调到位，而市场上却会出现降价促销的“价格战”。可以说，每一次成品油“价格战”都将定价机制推向尴尬境地，让其不合理性暴露无遗。

成品油“价格战”对于消费者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要看到，在不合理的定价机制之下，这种“价格战”掀不起多大浪潮，也难以持续。更让人担忧的是，据报道，为了更多地赚取成品油零售利润，中石油、中石化去年减少了成品油对外批发量，同时大量扩张自营加油站数量，将更多成品油直接供给旗下的加油站。而且，两大巨头的年报都显示，今年将进一步减少成品油批发，增加自身零售的比重。(4月11日《京华时报》)

可以想象，当石油巨头自营加油站完全控制了成品油零售市场，当从原油开采、进口、炼化到成品油批发、零售都被石油巨头“江山一统”，形成牢不可破的垄断堡垒，那么无论成品油库存有多么充足，无论政府定价多么虚高，无论加油站的利润有多么丰厚，恐怕都不会出现降价促销的“价格战”。 晏扬

近日，作为“改革开放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外资项目”，三星电子闪存芯片项目落地西安引发争论。媒体披露，该项目总投资将达300亿美元。而为了吸引落地，当地可谓下了血本，优惠条件吸引下来折合2000亿元乃至更多。

耗资2000亿“摘星”不合时宜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繁荣的秘密是什么？其中，独特的地方官员考核和激励机制并由此形成的地方GDP竞争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动力引擎算是“不争的事实”。沿海地区曾经用土地、廉价劳动力和税收等优惠配套设施等等吸引海外投资特别是跨国企业入驻。今天，这一模式的可持续性正在不断被质疑。

耗巨资“摘星”，实际上是沿海地区过去发展模式的翻版，之所以引起如此舆论反弹，则是因为过去被容忍的规则已经变得不合时宜：

首先是因为当地提供的这些优惠措施，是在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已被取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2010年12月，国务院统一内外资企业和个人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两税合一”被认为是外资企业优惠待遇变成平等待遇的标志；在中国加入世贸5年过渡期结束后，中国不仅其在税收政策回归国民待遇，而且有关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价格上、环保、劳工待遇、水、电、物流等方面，都取消了原来的多方面优惠。这一企业“平权运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走向成熟的表现。

我们也不难理解地方政府的急切，在2009年由国务院批复的《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中，西安被定为“国际化大都市”，并进一步要求在经济区建设“全国内陆型经济开发开放战略高地”和“统筹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但近年来，虽然经济总量不断提升，但以工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却一直处于颓势。而且，面对重庆、成都等西部中心城市的竞争，西安高新区在最近几年也缺乏类似重庆惠普、成都Intel等重量级外资项目。可以说，地方GDP竞争是这次“摘星”的主要推动力之一，而“摘星”到手后是否能复制此前长、珠三角等地的繁荣经验需要继续观察，但是从根本而言，这一简单重复的举动，在今天强调政府之手退出市场，寻找新发展方式的时刻，是对市场经济改革的某种破坏，也是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某种倒退。

耗巨资“摘星”另一不合时宜之处，在于今天经过互联网启蒙的民众，已然与20年前不同，对政府决策的透明化公开化阳光化均有更高的要求，如此大手笔的招商成本，已经很难重复过去的路径。“摘星”的消息一经披露，就有民间激烈反弹之声就是明证。 谢勇